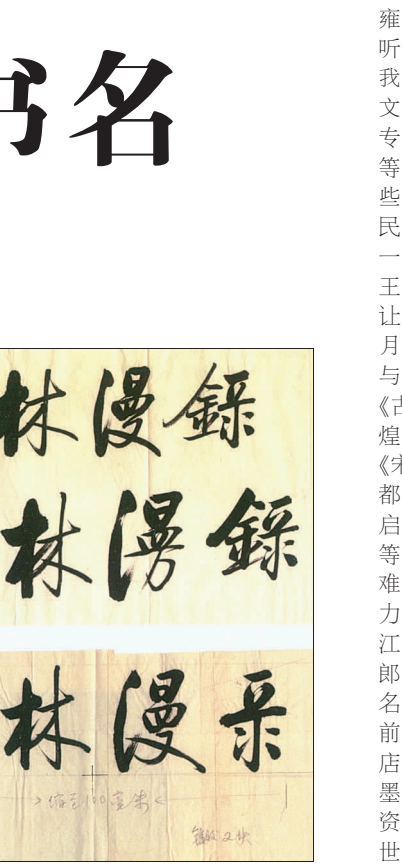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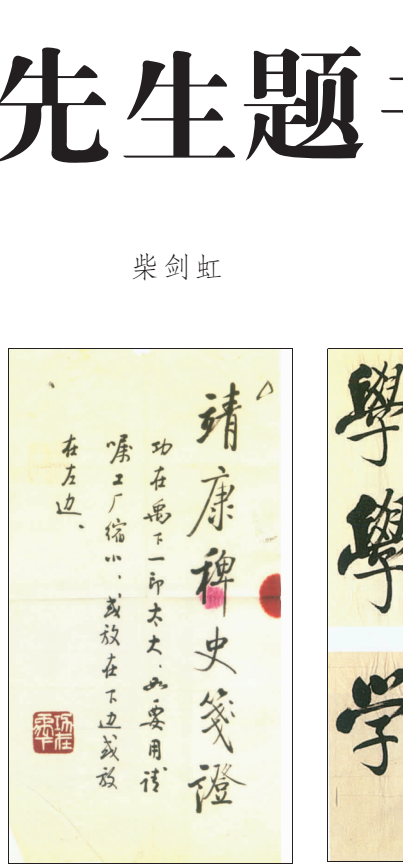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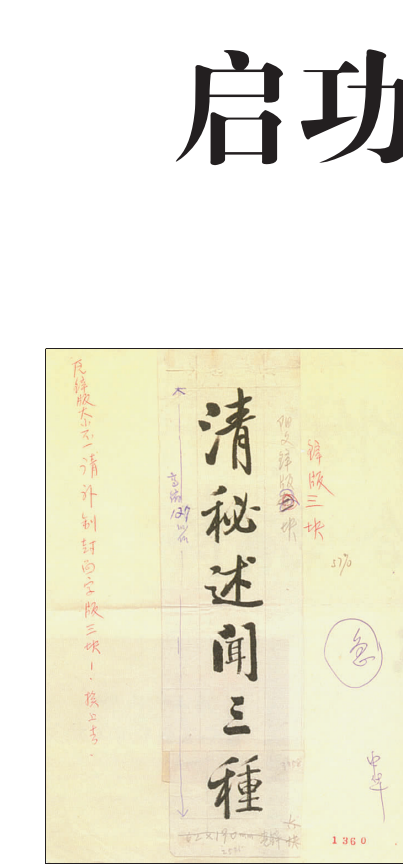


为纪念启功先生一百零五周岁诞辰，丁酉岁初，编集启先生为中华书局所出图书题签的《启功先生题签集》工作启动，书局徐俊总经理嘱我协助，得以又一次温习先生那些蕴涵博大精深学养的墨宝，许多熟知的往事涌上心头。

为出版物题写书名，启功先生按本意写作“题籤”，所钤印文亦然，现简写为“题签”。启功先生为出版社图书题签，数量至鉅，这同题写牌匾、机构名称等一样，是他书法艺术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启功先生为中华书局图书题签，按出版时间算，最早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初，即“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一幅，该集 1962 年出版。70 年代初，他奉命从北京师范大学借调到书局参加“二十四史”与《清史稿》的校点工程。当时能暂离校园风暴，脱身于批斗“臭老九”漩涡的启功先生，在庆幸自己能比较安心地在书局这一方小天地里奉献学问之际，更把书局称为自己的“第二个家”，自然愿为“自家”多做些力所能及之事——可惜当时书局也并非世外桃源，在发号施令的“造反派”眼里，这批有着“反动学术权威”等身份的人，是不准“乱说、乱动、乱写”的；尽管启功先生当时为书局一些员工书写过条幅（大多是毛主席诗词），而题签甚寥，1973、1974、1975 三年共六幅，且当时所出为数不多的图书中需学者题签者也不多。“文革”后，先生回师大继续任教，他在书法界的声名鹊起，随着书局出版的图书日益增加，无论是作者或编辑请启功先生题签的要求也持续不断。先生则一如既往地地热诚允诺，及时书写，在 1977、1978 年所出图书中各有两幅，而改革开放伊始的 1979 年则有十二幅，为书局的人文史类出版物增添了光彩。

1978 年，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我从新疆考回母校北师大中文系师从启功、郭预衡、邓魁英、聂石樵、韩兆琦等教授研读中国古代文学。1980 年，作为撰写《岑参边塞诗研究》硕士论文的基础工作，我撰写了一些考辨西域地名的短文，呈给启功先生批阅。启先生看了以后，特意写信给书局傅璇琮先生，将其中的《“瀚海”辨》一文推荐给创刊不久的《学林漫录》，肯定我这篇文章有新意，适合在这个辑刊发表。1981 年初，拙文便刊登在《学林漫录》第二集中——而该集的书名即是启功先生所题。这一年，书局图书有启先生题



图为启功先生题签原稿，均选自《启功先生题签集》

签十四幅，可谓数量空前。1981 年秋季我毕业分配时，启功先生又推荐我到书局进入文学编辑室工作。这个时期书局的文学编辑室，老中青三代编辑人才济济，出版古代文学典籍整理本与相关学术论著亦呈现一个小高潮，别的编辑室出版物也有较大增长，我因常回师大看望启功先生，即充当了频频请先生题签的“联络员”。据我统计，从 1982 年到 1987 年的六年中，启功先生为书局题签七十幅，占这个题签集所收总计一百七十五幅的 40%，几乎每月一幅。自 1987 年夏秋之际我调到《文史知识》编辑部工作后，虽有时也依然会承担一些责编向启功先生求题书签的任务，但毕竟不像之前那么便捷了，加上其他原因，先生题签的数量也减少了许多。1988 至 1999 的十二年间，书局出版物中有先生题签的四十七幅，约平均每年四幅。2000 年至去世前一年的 2004 年，先生因身体原因，尤其是目疾严重，用毛笔书写已相当困难，但对书局的题签之请，则改用硬笔勉力而为，还书

写了八幅。以上所述，只是题签数量上的统计，而启功先生的题签，还有更多感人的故事。对此，本集所附启先生的大弟子来新夏教授的《启功老师题书签》一文（原载《文汇报书周报》）中有生动的叙述。下面我再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作些补充。

与当下有些书家为图书题签开价取酬迥异，启功先生为书局题签始终不收分文。记得有一回书局领导想给启先生的题签开“润笔”，让我了解别的出版社相关标准并征求先生意见。先生听我报告后，十分严肃地说：“书局是我第二个家，为自家干活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岂可获取报酬啊？”启先生不仅对书局出版物题签“有求必应”（程毅中先生语），还常常主动为设计图书封面的美编着想，在题签前仔细询问书的开本大小、封面配图、繁体简体、竖排横排等情况，以便于安排字体的繁简、大小与位置。那时书局设计封面基本上靠美编自己绘图，而先生则对书局几位美编的一些专业特长也有所了解，有时题签还会尽量

地死抠书本，而是“海阔天空地去思考问题”。如果再去读一读英国旅行家的游记，你会发现他们往往对于那些高天阔域之地趋之若鹜。我曾经采访过英国前皇家文学会会长、著名作家科林·索伯龙。有趣的是他的小说背景往往发生在病房或监狱等极为有限的空间，表现了英剧玲珑场景之特色，然而他的游记却发挥出另极空间叙述，广阔的空间从丝绸之路、中东沙漠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

顺便一提英语在海洋这方面的词汇也非常丰富，就像爱斯基摩语言表达雪的词汇一样储备雄厚，说明了英语民族尤其是英国历来与海洋的密切关系。海洋带给这个民族不仅仅仅是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机遇，也带来了开放的心态和自由的想象力。十分关注人地关系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感慨道：“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算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清代闭关锁国敲起的一记警钟和唤醒开放心态的呼吁。

走出去，打破地域之囿同样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夙愿和实践。众多伟大的中国旅行家、航海家和探险家曾经留下过勇闯天涯海角的历史足迹。无论是美洲大陆、地中海还是波斯湾都发现华夏先民曾经到达和远涉的非凡历程，更不用说后来的郑和下的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的炫目一页。虽然中华民族的探险精神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在近代遭遇了闭关锁国的挫折，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今天，凭借着我国辽阔优越的海岸线和无远弗届的新丝绸之路的四通八达，华夏祖先所创造的丝路文明一定会浴火重生。这，也许正是影片《迷失 Z 城》带给我们的一些新的思索，一带一路势必激发新时代的地理探险和更高层次的文化超越。

幽暗的电影院里，黑白银幕上正演绎着丁务源和树华农场故事——根据老舍作品改编的《不成问题的问题》。隔着包，手机开始振动。拿出来一看，是老妈打来的。琐琐碎碎讲了一大通，我低低地回应：“我在看电影。”她“喂?! 喂?!”地叫着，我只得稍稍提高音量，说：“我在看电影。”老妈笑了一声，问：“跟啥人一道看呢?”“我一个人。”老妈的笑声里满是惊讶：“啊? 一个人看电影?”

曾几何时，看电影，似乎是情侣和朋友们之间的专项活动，尤其是那些刚刚开始谈恋爱的青年男女。在银幕反射过来的明灭光线中，男生可以试探着握一握女生的手；看到惊悚处，女生可以把头依偎在男生的怀里……

要是在几年前，我也觉得，一个人去电影院有点不可思议。要么和家人同观，要么跟朋友约好。这几年，渐渐觉得，起了家人或者朋友一起看



笔会

启功先生题书名

柴剑虹

筆會



未完成的路

（雕塑）

彼得·耶尔[美国]

一个人看电影

孔 曦

电影有点奢侈，习惯了独自去电影院。细细想来，年轻的时候，我也常常一个人看电影。

大二还是大三那年，我买了电影票，和弟弟一起看《绝唱》。影片快结束时，我哭到哽咽，坐在一旁的弟弟甚是不解。自此，每逢有喜欢的电影上映，我就一个人去看。

自小，我就被邻人介评为“怪”。现在想来，这个“怪”与成长经历有关。小时候，在上海的父亲工作很忙，经常出差。母亲在郊区的乡村小学教书，五年小学，我跟着她换了两个学校，只有学校图书室里的书是我

的好朋友。11 岁那年，我回到父亲身边，因为年龄太小，中学不收，又读了一年小学。那些女孩子之间谁跟谁好、谁跟谁不好的“窍槛”（沪语：窍门、奥秘），我一点也不懂。与人相处的“窍槛”，直至我读到一篇海上女作家的随笔才明了。文中讲到她的中学时代，每年夏天，女同学们都叫着“热啊热啊”，却都不肯率先穿裙子。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到了夏天，觉得该穿裙子，就穿了。如此我行我素、目中无人，招致“大姐大”怨恨也难说……

再说回到看电影——这年头大家

雍文华（与我同届的社科院研究生）听说后十分欣喜。1983 年，室领导让我担任已故王重民先生《敦煌遗书论文集》的责编，启先生在书写题签时，专门给我讲述了 50 年代中他和王先生等学者一道编著《敦煌变文集》的一些往事，为在“文革”中受迫害的重民先生过早弃世而叹息不已，嘱咐我一定要编好此书。书名题写后，美编王增寅几易设计稿，并预先印好张样让我呈启先生审定，该书于 1984 年 4 月出版，获得了学界的好评。之后，与我编辑工作关系密切的一些书，如《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元诗选》《敦煌文学作品集》《文学二十家传》《宋诗纵横》《晚清小说理论》等，也都是先生主动提出题签的。2001 年，启功先生因眼睛黄斑病变和前列腺病等身体原因，用毛笔书写已经十分困难，但只要书局有题签需求，仍勉力用硬笔书写。2002 年，北大荣新江、朱玉麒二位合著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由我担任责编，书名即请启先生用硬笔题写。在此之前，先生特意将他从日本东京旧书店购得的一函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送我，指出此书资料珍贵，在东瀛已经印行大半个世纪，中国读者却难得阅读，很有必要译成中文出版，嘱我找人翻译。我遂请国家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的李德范女士翻译全书，并配了图版，列入汉学编辑室的“世界汉学论丛”，于 2003 年 8 月正式出版。是书印制前，启先生特地用硬笔在宣纸上题写书名，因书名较长，不便与论丛的其他书配套，便将先生的题签单印制于扉页之中。还有，法国汉学家戴廷杰先生费十年之功用中文撰著的《戴名世年谱》，是我退休前担任责编的最后一本书。我曾陪作者两次拜访启先生，先生很赞赏这位汉学家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在身体衰弱的情况下，还用硬笔为此书题写了书名（遗憾的是这次印制漏了此幅）。当时先生俯身低首执笔题签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丁酉岁杪，《启功先生题签集》正式印行。启先生为中华书局出版物的题签，是他书法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留给“第二个家”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保护与传承这份遗产的必要举措，该书的出版，其意义非同一般，其影响将把深远。

2018 年元月 7 日定稿

没留照片的 学生们的

詹丹

远方的一位朋友发来微信，让我看他们的优秀学生的作文，说虽然文从字顺、情感四溢，但文艺腔厉害，似乎缺少了一点对生活的真切之感。

突然间，三十多年前我在嘉定城区教过的初中生就联翩出现在眼前了：

一位作文很出色的女生，写她生病的时候，开头寥寥数语，就能把人带到现场，带人那种氛围中：

“爸爸宽厚的手掌轻轻盖在眼皮上，粗糙、温暖，挡住了昏黄的灯光。于是，昏昏沉沉地我睡着了。——这不是回到了小时候，而是我生病了。”

又写她学龄前，晚上和妹妹躺在爸爸的各一边听他讲故事，爸爸的头不许朝哪边偏，于是每晚只能望着天花板，给她们讲故事，声音好像从天花板上折回来似的，但两人都听得津津有味。一个细节描写，把儿童的心态和家庭的温馨都表现出来了。

她初中的几乎所有作文和随笔，我都保存了下来。后来到大学教那些师范生写作文，还不时地会拿出她的作文来给学生作例子。

当年她中学毕业想报考复旦中文系，父母说，你的中文还要学吗？于是报考了经济系，至今一直在金融单位工作。结婚时，我复印了她全部作业，把原稿作为礼物送给她，她很惊讶，说以前写过的什么，自己大多已忘记，想不到老师还保存着。现在她女儿也写得一手好作文，有时候还在微信上转发。

一位坐前排的男生，上课老喜欢插嘴。有一次语文课上，我在介绍郑振铎生平时，说他 1958 年出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时，飞机失事去世了。他马上插嘴说，老师说错了老师说错了。我问为什么？他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970 年后才成立，他 58 年怎么可能去？或许不是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吧？我说这个倒不太清楚了，等我去查查确凿后，下节课再来说，但你回答问题要先举手的。他说，老师您又把概念搞错了，我不是在回答您的问题，是发现了您讲课的问题。后来，他早晨广播操没认真做，我把他留下，让他重做。他说，老师您在体罚学生，体罚学生的老师只是说明了自己的无能，您不想做无能的老师吧？我马上回答他，这不是体罚，是锻炼。你没做好广播操，所以我给你提供了锻炼的机会，这回我没搞错概念。他似乎看出我意有所指，一脸坏笑的样子说：老师，您可是有报复的嫌疑呀……

再一位女生，上课老是和后排的男生讲话，滔滔不绝，旁若无人，引得各任课老师纷纷到我这位班主任面前来告状，还如临大敌似地提醒我，莫不是两人在谈恋爱？

我找到那位女生，还没等我开口，她先说了：我知道老师要找我什么事，我也知道上课讲废话不好，但我就是忍不住，看见他进教室，就想和他说话。我说，他坐你后排，你怎么看得见他？她说，我也不知为什么，我不回头，就知道他已经到教室了。回头再看，没有错过一次的。这不算心灵感应吧？看着她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我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还有一位，是初二转过来的女生，笑起来很灿烂，由熟人领着到我办公室报到，当时办公室正在搞大扫除，我提一桶脏水要出门去倒掉，她个子不高，但硬是从我的手里把沉沉的一桶水抢了过去，径直往走廊一头走过去，没找到卫生间，又拎着那桶水返回来笑吟吟地问我：老师，我该把脏水倒哪里呀？

另有一位女生，在会上交流发言时，突然就自豪地宣布，我们班主任是南翔来的，我们校长也是南翔来的，我也是南翔来的。我以我是一名南翔人而骄傲！说得全场一愣，然后大笑不已。

也是这位学生，曾问我为什么要当老师，其实我自己也说不上来。

但我读中学的两次感受，记忆深刻，或许对我当教师有一点推动作用。一次是看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位已经年老的女教师，在舞会上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学生，从门外一个个进来，向她问好，然后就一起在大厅里旋转旋转……

还有我看亚米契斯小说《爱的教育》，其中讲到有位年老生病在床的退休教师，墙上挂满了学生的照片，有满满的幸福感。

我没有留以前教过的学生照片，但他们总带给我一些亲切的怀念和记忆。